

魯迅
二心集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一九五八年·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东四头条九号)

此书由新华书店总店新书部出版发行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印数 10000 册本 850×1160mm^{1/32} 印张 1.75 面积 1.75

1958年1月北京第1版 1958年1月北京第1次

印数00001~30700册

定价620.75元

出版說明

本書這次出版，曾經依照作者亲自編校的初版，并且參照各篇最初發表時的雜誌，作了初步的校勘。凡在以往各種版本中存在而為我們所已發現的排印上的錯誤，都已經加以改正。同時，我們又試加了一些注釋，附在全書的後面，在正文中則標以1、2、3……的號碼。

本書最初于一九三二年十月由上海合眾書店出版。出版後不久即被國民黨反動政府禁止，曾由合眾書店選取其中十六篇，並改題為《拾零集》在一九三四年十月出版。在一九三八年由魯迅先生紀念委員會編輯、魯迅全集出版社出版的《魯迅全集》中，本書編入第四卷；一九四一年魯迅全集出版社印行《魯迅三十年集》時，本書也曾收入。

本書這次試加的注釋，不妥、錯誤和不充分的地方一定不少，懇切希望讀者指正。

人民文學出版社編輯部

一九五六年十二月

目 录

序言..... 1

一九三〇年

“硬譯”与“文学的阶级性”.....	7
習慣与改革.....	26
非革命的急进革命論者.....	29
張資平氏の“小說学”.....	32
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見.....	34
我們要批評家.....	40
“好政府主义”.....	42
“喪家の”“資本家の乏走狗”.....	44
《进化和退化》小引.....	47
《艺术論》譯本序.....	49
做古文和做好人的秘訣(夜記之五,不完。).....	62

一九三一年

关于《唐三藏取經詩話》的版本.....	69
柔石小傳.....	71

中国無产阶级革命文学和前驅的血	73
黑暗中国的文艺界的現状	75
上海文艺之一瞥	80
一八艺社習作展览会小引	94
答文艺新聞社問	95
“民族主义文学”的任务和运命	96
沈淳的泛起	106
以脚报国	109
唐朝的釘梢	112
《夏娃日記》小引	114
新的“女将”	116
宣傳与做戏	118
知难行难	120
几条“順”的翻譯	122
風馬牛	125
再来一条“順”的翻譯	128
中华民国的新“堂·吉訶德”們	131
《野草》英文譯本序	133
“智識劳动者”万岁	135
✓“友邦惊詫”論	137
答中学生杂志社問	140
答北斗杂志社問	141
关于小說題材的通信(并 Y 及 T 来信)	143
关于翻譯的通信(并 J. K. 来信)	147

現代电影与有产阶级(譯文，并附記).....165

注釋191

序　　言

这里是一九三〇年与三一年两年間的杂文的結集。

当三〇年的时候，期刊已漸漸的少見，有些是不能按期出版了，大約是受了逐日加紧的压迫。《語絲》¹和《奔流》²，則常遭邮局的扣留，地方的禁止，到底也还是敷延不下去。那时我能投稿的，就只剩了一个《萌芽》³，而出到五期，也被禁止了，接着是出了一本《新地》。所以在这一年內，我只做了收在集內的不到十篇的短評。

此外还曾經在学校里演講过两五回⁴，那时無人記录，講了些什么，此刻連自己也記不清楚了。只記得在有一个大学里演講的題目，是《象牙塔和蝸牛廬》⁵。大意是說，象牙塔里的文艺，将来决不会出現于中国，因为环境并不相同，这里是連摆这“象牙之塔”的处所也已經沒有了；不久可以出現的，恐怕至多只有几个“蝸牛廬”⁶。蝸牛廬者，是三国时所謂“隱逸”的焦先曾經居住的那样的草窠，大約和現在江北穷人手搭的草棚相仿，不过还要小，光光的伏在那里面，少出，少动，無衣，無食，無言。因为那时是軍閥混战，任意杀掠的时候，心里不以为然的人，只有这样才可以苟延他的殘喘。但蝸牛界里那里会有文艺呢，所

以这样下去，中国的沒有文艺，是一定的。这样的話，真可謂已經大有蝸牛氣味的了，不料不久就有一位勇敢的青年在政府机关的上海《民国日报》上給我批評，說我的那些話使他非常看不起，因为我沒有敢講共产党的話的勇气。謹案在“清党”以后的党国里，講共产主义是算犯大罪的，捕杀的网罗，張遍了全中国，而不講，却又为党国的忠勇青年所鄙視。这实在只好变了真的蝸牛，才有“庶几得免于罪戾”的幸福了。

而这时左翼作家拿着苏联的卢布之說，在所謂“大报”和小报上，一面又紛紛的宣傳起来，新月社的批評家也从旁很卖了些力气⁷。有些報紙，还拾了先前的創造社派的几个人的投稿于小报上的話，譏笑我为“投降”，有一种報則載起《文壇貳臣傳》来，第一个就是我，——但后来好像并不再做下去了。

卢布之謠，我是听惯了的。大約六七年前，《語絲》在北京說了几句涉及陈源教授和别的“正人君子”們的話的时候，上海的《晶报》上就發表过“現代評論社主角”唐有壬先生的信札，說是我們的言动，都由于莫斯科的命令⁸，这又正是祖傳的老譖，宋末有所謂“通虜”，清初又有所謂“通海”⁹，向来就用了这类的口实，害过許多人們的。所以含血噴人，已成了中国士君子的常經，实在不单是他們的識見，只能够見到世上一切都靠金錢的势力。至于“貳臣”之說，却是很有些意思的，我試一反省，觉得对于时事，即使未尝动笔，有时也不免于腹誹，“臣罪当誅今天

皇聖明”，腹誹就決不是忠臣的行徑。但御用文學家的給了我這個徽號，也可見他們的“文壇”上是有皇帝的了。

去年偶然看見了几篇梅林格 (Franz Mehring)¹⁰ 的論文，大意說，在壞了下去的舊社會里，倘有人懷一點不同的意見，有一點攜貳的心思，是一定要大吃其苦的。而攻擊陷害得最凶的，則是這人的同階級的人物。他們以為這是最可惡的叛逆，比異階級的奴隸造反還可惡，所以一定要除掉他。我才知道中外古今，無不如此，真是讀書可以養氣，竟沒有先前那樣“不滿于現狀”¹¹ 了，並且仿《三閑集》之例而變其意，拾來做了這一本書的名目。然而這並非在證明我是無產者。一階級里，臨末也常常會自己互相鬧起來的，就是《詩經》里說過的那“兄弟鬭于牆”，——但後來却未必“外御其侮”。例如同是軍閥，就總在整年的大家相打，難道有一面是無產階級么？而且我時時說些自己的事情，怎樣地在“碰壁”，怎樣地在做蝸牛，好像全世界的苦惱，萃于一身，在替大眾受罪似的：也正是中產的智識階級分子的壞脾氣。只是原先是憎惡這熟識的本階級，毫不可惜它的潰滅，後來又由於事實的教訓，以為惟新興的無產者才有將來，却是的確的。

自从一九三一年二月起，我寫了較上年更多的文章，但因為揭載的刊物有些不同，文字必得和它們相稱，就很少做《熱風》那樣簡短的東西了；而且看看對於我的批評文字，得了一種經驗，好像評論做得太簡括，是極容易招得無意的誤解，或有意的曲解似的。又，此後也不想再編

《坟》那样的論文集，和《壁下譯丛》那样的譯文集，这回就连較长的东西也收在这里面，譯文则选了一篇“現代电影和有产阶级”¹² 附在末尾，因为电影之在中国，虽然早已風行，但这样扼要的論文却还少見，留心世事的人們，实在很有一讀的必要的。还有通信，如果只有一面，讀者也往往很不容易了然，所以将紧要一点的几封来信，也擅自一并編进去了。

一九三二年四月三十日之夜，編訖并記。

一九三〇年

“硬譯”与“文学的阶级性”¹

听说《新月》月刊团体里的人们在说，现在销路好起来了。这大概是真的，以我似的交际极少的人，也在两个年青朋友的手里见过第二卷第六、七号的合本。顺便一翻，是争“言论自由”²的文字和小说居多。近尾巴处，则有梁实秋先生的一篇《论鲁迅先生的“硬译”》，以为“近于死译”。而“死译之风也断不可长”³，就引了我的三段译文，以及在《文艺与批评》⁴的后记里所说：“但因为译者的能力不够，和中国文本来的缺点，译完一看，晦涩，甚而至于难解之处也真多；倘将仂句拆下来呢，又失了原来的语气，在我，是除了还是这样的硬译之外，只有束手这一条路了，所余的唯一的希望，只在读者还肯硬着头皮看下去而已”这些话，细心地在字旁加上圆圈，还在“硬译”两字旁边加上套圈，于是“严正”地下了“批评”道：“我们‘硬着头皮看下去’了，但是無所得。‘硬译’和‘死译’有什么分别呢？”

新月社的声明中，虽说并无什么组织，在论文里，也似乎痛恶无产阶级式的“组织”、“集团”这些话，但其实是

有組織的，至少，关于政治的論文，这一本里都互相“照应”；关于文艺，则这一篇是登在上面的同一批評家所作的《文学是有阶级性的嗎？》⁵的余波。在那一篇里有一段說“……但是不幸得很，沒有一本这类的書能被我看懂。……最使我感得困难的是文字，……簡直讀起来比天書还难。……現在还没有一个中国人，用中国人所能看得懂的文字，写一篇文章告訴我們無产文学的理論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字旁也有圈圈，怕排印麻烦，恕不照画了。总之，梁先生自認是一切中国人的代表，这些書既为自己所不懂，也就是为一切中国人所不懂，應該在中国断絕其生命，于是出示曰“此風斷不可长”云。

别的“天書”譯著者的意見我不能代表，从我个人来看，则事情是不会这样简单的。第一，梁先生自以为“硬着头皮看下去”了，但究竟硬了沒有，是否能够，还是一个問題。以硬自居了，而实則其軟如棉，正是新月社的一种特色。第二，梁先生虽自来代表一切中国人了，但究竟是否全国中的最优秀者，也是一个問題。这問題从《文学是有阶级性的嗎？》这篇文章里，便可以解釋。Proletary 这字不必譯音，大可譯义，是有理可說的。但这位批評家却道：“其实翻翻字典，这个字的涵义并不見得体面，据《韦白斯特大字典》，Proletary 的意思就是：A citizen of the lowest class who served the state not with property, but only by having children。……普罗列塔利亚是国家里只会生孩子的阶级！（至少在羅馬时代是如此）”其实正無須

来爭这“体面”，大約略有常識者，总不至于以現在为羅馬时代，将現在的無产者都看作羅馬人的。这正如将 Chemie 譯作“舍密学”⁶，讀者必不和埃及的“炼金术”混同，对于“梁”先生所作的文章，也决不会去考查語源，誤解为“独木小桥”竟会动笔一样。連“翻翻字典”（《韦白斯特大字典》！）也还是“無所得”，一切中国人未必全是如此的罢。

二

但于我最觉得有兴味的，是上节所引的梁先生的文字里，有两处都用着一个“我們”，頗有些“多数”和“集团”气味了。自然，作者虽然单独执笔，气类則决不只一人，用“我們”來說話，是不錯的，也令人看起来較有力量，又不至于一人双肩負責。然而，当“思想不能統一”时，“言論應該自由”时，正如梁先生的批評資本制度一般，也有一种“弊病”。就是，既有“我們”便有我們以外的“他們”，于是新月社的“我們”虽以为我的“死譯之風斷不可长”了，却另有讀了并不“無所得”的讀者存在，而我的“硬譯”，就还在“他們”之間生存，和“死譯”还有一些区别。

我也就是新月社的“他們”之一，因为我的譯作和梁先生所需的条件，是全都不一样的。

那一篇《論硬譯》的开头論誤譯胜于死譯說：“一部書断断不会完全曲譯……部分的曲譯即使は錯誤，究竟也还給你一个錯誤，这个錯誤也許真是害人無穷的，而你讀的时候究竟还落个爽快。”末两句大可以加上夹圈，但我却从来

不干这样的勾当。我的譯作，本不在博讀者的“爽快”，却往往給以不舒服，甚而至于使人气悶，憎惡，憤恨。讀了会“落个爽快”的东西，自有新月社的人們的譯著在：徐志摩先生的詩，沈从文凌叔华先生的小說，陈西滢（即陈源）先生的閑話，梁实秋先生的批評，潘光旦先生的优生学，还有白璧德先生的人文主义。

所以，梁先生后文說：“这样的書，就如同看地圖一般，要伸着手指来寻找句法的綫索位置”这些話，在我也就覺得是廢話，雖說犹如不說了。是的，由我說來，要看“这样的書”就如同看地圖一样，要伸着手指来找寻“句法的綫索位置”的。看地圖虽然沒有看“楊妃出浴圖”或“岁寒三友圖”那么“爽快”，甚而至于还須伸着手指（其实这恐怕梁先生自己如此罢了，看慣地圖的人，是只用眼睛就可以的），但地圖并不是死圖；所以“硬譯”即使有同一之劳，照例子也就和“死譯”有了些“什么区别”。識得ABCD者自以为新学家，仍旧和化学方程式無关，会打算盘的自以为数学家，看起笔算的演草来还是無所得。現在的世間，原不是一为学者，便与一切事都会有緣的。

然而梁先生有实例在，举了我三段的譯文，虽然明知道“也許因为沒有上下文的緣故，意思不能十分明了”。在《文学是有阶级性的嗎？》这篇文章中，也用了类似手段，举出两首譯詩来，总評道：“也許偉大的無产文学还没有出現，那么我願意等着，等着，等着。”这些方法，誠然是很“爽快”的，但我可以就在这一本《新月》月刊里的創作——是

創作呀！——《搬家》第八頁上，舉出一段文字來——

“小鷄有耳朵沒有？”

“我沒看見過小鷄長耳朵的。”

“它怎樣聽見我叫它呢？”她想到前天四婆告訴她的耳朵是管聽東西，眼是管看東西的。

“這個蛋是白鷄黑鷄？”枝兒見四婆沒答她，站起來摸着蛋子又問。

“現在看不出来，等孵出小鷄才知道。”

“婉兒姊說小鷄會變大鷄，這些小鷄也會變大鷄么？”

“好好的餵它就会长大了，像这个鷄买来时还没有这样大吧？”

也够了，“文字”是懂得的，也無須伸出手指來尋繩索，但我不“等着”了，以為就這一段看，是既不“爽快”，而且和不創作是很少區別的。

臨末，梁先生還有一个詰問：“中國文和外國文是不同的，……翻譯之難即在這個地方。假如兩種文中的文法句法詞法完全一樣，那麼翻譯還成為一件工作嗎？……我們不妨把句法變換一下，以使讀者能懂為第一要義，因為‘硬着頭皮’不是一件愉快的事，並且‘硬譯’也不見得能保存‘原來的精悍的語氣’。假如‘硬譯’而還能保存‘原來的精悍的語氣’，那真是一件奇蹟，還能說中國文是有‘缺点’嗎？”我倒不見得如此之愚，要尋求和中國文相同的外國文，或者希望“兩種文中的文法句法詞法完全一樣”。我但